

康有为及其《日本书目志》

沈 国威

要 旨

康有为の『日本書目志』は近代日中文化交流を考える上で極めて興味深い文献である。しかし書目志は何を素材に編纂されたのか、収録書はどのような性質のものか、19世紀末当時、日本書は中国ではどのように読まれたのか、康有为ないし彼周囲の人たちが日本書の内容をどこまで理解できたのか等について必ずしも明らかにされていないのが現状である。本稿は書目志の収録書、及び康氏が書き加えた「案語」を詳細に吟味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次のような結論を得た：康有为は、書目志の編纂に当たって創意を加えることが少なく、収録書から分類までほぼ全面的に日本の書肆の目録を踏襲していた、康氏が実際に入手できた日本書は少量で、またこれらの書物から新知識を体系的に習得した事実も確認できない。

1 問題的提起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条中见：撰日本书目志。又，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条下记载：（六月之前）撰日本书目志成¹。《日本书目志》稿成后，于1898春之前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²。甲午之后，向日本学习渐成风气，但是日本书流入中国还不多。康的书目志是为我国第一本关于日本书的目录，意义不凡。这标志着中日文化流向逆转的事实已为时代的先觉所把握。但是对这一重要的资料，史学界康有为研究中似重视不够。除坂出祥伸等人的著作对本书目志有所涉及外，笔者疏陋，不见有专文详细考察³。康根据什么材料编辑了《日本书目志》，当时日本书流入中国的情况如何，康以及其周围的人日语文献利用能力的高下，康本人对西方近代的新知识了解到什么程度？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并由此论及中日文化交流的若干细节。

¹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以下略为《自编年谱》

² 本文使用《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引用页数据此），并参校《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十一》台湾宏业书局影印版。坂出祥伸将刊行时间定为1898年秋，见注3的论文。但是，《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的“编校说明”考证：光绪24年3月30日申报的大同译书局新出各书的广告中，列有《日本书目志》，可知，春天既已刊行。张伯桢编《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曾提到书目志于戊戌八月毁板（后详），这也说明书目志在1898年秋季之前已经刊行。另自编年谱光绪23年（1897）项下见：是冬，幼博（康广仁）在上海大同译书局刻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日本书目志成。（36页）

³ 坂出祥伸「戊戌変法期における康有为の明治維新論」『関西大学文学論集』第41卷第4号、平成4年。本文后收入『改訂増補中国近代の思想と科学』朋友书店2001年579~593页。另孔祥吉指出：“《日本书目志》是研究康有为变法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但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又说：“《日本书目志》的按语中，包括了康有为许多重要的变法思想，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包含的内容至为丰富，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371~374页。

2 康有为的西学历程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二十二岁时（1879），

得西国近事汇编⁴，李圭环球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琼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9~10页）

这时，康有为第一次与西学邂逅，并接触到了殖民统治的实际情况。由“为讲西学之基”可知，这段经历对康的西学观确立影响极大。三年后，即康二十五岁（1882）时，北京科考失败，返乡时顺路访问了上海。他写到：

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十一月还家，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11页）

以上就是康有为本人自述的西学历程。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加之阅读汉译西书，康有为逐渐由旧学转向新学。然而，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康有为都收集并阅读了哪些书籍？从中得到了哪些与传统旧学不同的西方新知识？其本人除上引文例举的数种外并没有详加说明，以往的研究亦似乎追求不足⁵。从当时的出版情况看，康有为所能得到的书籍应为香港英华书院、上海墨海书馆、以及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北京同文馆等处的汉译西书。内容多为历史、地理，及一些启蒙性的科学普及读物⁶。可以断言，康有为“大购”的这些书籍虽然可以提供初步的西学知识，撩起他探求新世界的好奇心，但是，最终难以满足意欲在思想、制度层面改变中国的知识需要。

3 提倡译日文书：动机与背景

随着对西方的进一步了解，康有为愈加认识到了西书的重要性，同时，对当时汉译西书的现状和内容也就越来越不满意。康试图另辟蹊径，即不借助西人，而独自翻译西书。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他请友人张延秋向张之洞转达他的建议，《自述年谱》中这样写到：

时张之洞督粤，春间令张延秋编修告之曰：“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病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益开局译之，为最要事”（14页）。

对于康有为的建议，“张香涛然之，将开书局托吾与文艺阁任其事，既而不果。吾乃议以商力为之，事卒不成”。（《自述年谱》14页）政治上当道者感觉不到必要性、迫切性，商业上又似乎无利可图，事情便不了了之了。尽管如此，康有为仍是最早提出翻译西政书的中国人之一。康有为要比最早接触西方的其它人，更具有洞察力。例如，林则徐翻译了西方的报纸、杂志；魏源、徐继畲等根据西人提供的材料编纂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但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了解“夷情”“师夷长技”，还谈不上文化、制度层面的向西方学习。提议在上海建立同文馆的冯桂芬亦是如此。甚

⁴ 该书为西文报章的摘译，自1873（统治癸酉）年开始编辑出版，每年一卷。

⁵ 康有为著《桂学答问》。但是本书毋宁说是康西学所达到的西学境界并不深远的佐证。

⁶ 关于19世纪80年代止中国出版的汉译西书的详细情况，可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2期3~18页）。

至在 1894 年, 马建忠作《拟设翻译书院议》时仍然认为: 西人之所以敢悍然不顾, 胡作非为, 乃是“欺我不知情伪, 不知其虚实也”, 提议建翻译书院培养人才, 译西书以通外情⁷。这样的西书翻译动机远远无法与康有为相比。

甲午大败之后, 康有为愈发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挨打其总原因就是知识的落后。康有为反复强调: “泰西之强, 不在军兵炮械之末, 而在其士人之学, 新法之书。”(《日本书目志》自序) 所以, 中国要想富强只有讲求西学, 获取新知识。但是要吸取新知识, 又不能指望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子直接去读西书, 于是只剩译书一途。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自序说:

泰西百年来诸业之书万百亿千, 吾中人识西文者寡, 待吾数百万吏士识西文而后读之, 是待百年而后可, 则吾终无张灯之一日也。故今日欲自强, 惟有译书而已。(584 页)

康在代张之洞拟的《上海强学分会序》(1895) 中这样写道:

尝讲求西学之法, 以译书为第一义。(中略) 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学, 莫若译成中文之书, 俾中国百万学人人能解, 成才自众, 然后可给国家之用⁸。

康有为还多次指出官办译书局以往翻译西书上的弊端:

昔者大学士曾国藩开制造局于上海以译书, 于今四十年矣。其天津、福建、广州亦时有所译。然皆译欧美之书, 其途至难, 成书至少; 既无通学以主持之, 皆译农、工、兵至旧非要之书, 不足以发人士之通识也。徒费岁月, 糜巨款而已⁹。

但是, 西文难学, 西书难译。短时间内难以见效。更何况, 列强环视, “吾国岌岌, 安得此从容岁月?”(《日本书目志》自序) 客观形势已经不允许中国慢条斯理地译书了。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 1897 年的“大同译书局叙例”中说:

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 (中略) 举一国之才智, 而学西文, 读西籍, 则其事又迂远, 恐有所不能待, (中略) 今不速译书, 则所谓变法者, 尽成空言, 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虽然, 官译之书, 若京师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上海制造局, 始事迄今, 垂三十年, 而译成之书不过百种; 近且悉辍业矣。然则以此事望之官局, 再自今以往, 越三十年, 得书可二百种, 一切所谓学书、农书、工书、商书、兵书、宪法书、章程书者, 尤是万不备一, 而大事之去, 固已久矣¹⁰。

在这种不译书则无从富强, 而译书一无人才, 二无时间的极为尴尬的情况下, 由日文转译西书, 作为一种权宜之计, 便被提了出来。首倡者即是康有为。

康有为何时开始注意日本书的呢? 他在《自述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 条下这样写到:

⁷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张静庐辑注, 上杂出版社 1953 年 29~34 页。当然, 1894 年, 上海、北京的官方译书机关已经不能正常发挥作用。马的建议亦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⁸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38 页。

⁹ “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摺”《戊戌奏稿》, 亦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张静庐, 中华书局 1958 年 47~49 页。

¹⁰ 《饮冰室文集之二》, 亦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52~53 页。

“自丙戌年(1886)编日本政变记,披罗事迹,至今十年。”也就是说,康有为在1886年即开始关注日本的变法维新,收集资料编纂《日本变政记》了¹¹。康有为在书日志的自序中这样说:

日人之祸,吾自戊子(1888)上书言之,曲突徙薪,不达而归,欲结会以译日书久矣,而力薄不能成也。¹²(586页)

这里所说的“上书”,即是“上清帝第一书”。其中有:

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具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不敢伺,

的表述¹³。可知康有为对日本的变法有所了解。但是康的“欲结会以译日书”的计划在甲午之前终于没有能够实现。康有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在书日志的自序中他叹惜到,“呜呼!使吾会成,日书尽译,上之公卿,散之天下,岂有割台之事乎?”但是,应该注意:康有为在80年代中还不一定具有通过日本书学习西方的明确认识。也许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了解这个“崎岖小国”在干什么,或者借助日本变法来说服清王朝不要那么顽固地抱住祖宗之法不放。

关于提倡翻译日文书的理由,有两个。其一是日本已经将西方的有用之书都翻译完毕,康说:

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姑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书日志自序)

其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摺》)

其二是,中日同文,译日本书可以事半功倍,省时省力。康有为在书日志的自序中这样说:

日本文字尤吾文字也,但稍杂空海之伊吕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

康有为1898年上《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摺》说:

臣愚颡颡思之,以为日本与我同文也,(中略)译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至少,其费日无多也。请在京师设译书局,妙选通人主之,听其延辟通学,专选日本政治之佳者,先分科程并译之。不岁月后,日本佳书,可大略皆译也。(48~49页)

康有为的观点在当时极有影响。总理衙门上奏皇帝说:

至日本明治以来,所译书极多,而由东译华,较译自西文尤为便捷,应请饬下出使大臣,饬

¹¹ 康有为在戊戌奏稿“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说:“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已著也。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及马江败后,臣告长吏,开局译日本书,不见信。”文中“琉球被灭”云云是指1875年琉球实际并入日本,当时康有为仅18岁。台湾的黄彰健指出,这个奏稿是康有为事后伪托的,与事实不符(《戊戌变法史研究》570~572页)。尽管如此,康有为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关注日本却是事实。可以认为这种关注是受了传教士及其媒体的影响。

¹² 自序未署日期,但是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5期(光绪23年10月21日,公历1897.11.15)上发表了《读日本书日志后》,其中引述了康有为的自序。可以认为此文受有康有为的影响。

¹³ 《康有为全集第一集》(360页)

查日本所译西书，全数购寄，以便译印。（改译书局为译书官局摺 1898）

而在这前一年，康有为已经开始着手创办译书局了，即，“大同译书局”。设立大同译书局的目的则如梁启超所说：

联合同志，创为此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中略）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

《日本书目志》就是这样一本推动译日文书的目录。康有为在书目志的自序中说：

购求日本书至多，为撰提要，欲吾人共通之。因《汉志》之例，撮其精要，剪其无用，先著简明之目，以待忧国者求焉。

4 《日本书目志》的书志

如前文所述，《日本书目志》于戊戌春由大同译书局出版后马上遭遇政变，主持书局的康广仁被杀。张伯桢编《万木草堂丛书目录》中说：“日本书目考，丁酉印于上海，戊戌八月、庚子正月，两奉伪旨毁板”¹⁴。因此本书流传较少。坂出祥伸说：“この書について、従来日本の研究者は、国内にはない、台湾の中央研究院に所蔵されているとのべているが、実は日本には二箇所に所蔵されている。東京・東洋文庫と千葉県成田図書館（康有為とかかわりの深い柏原文太郎代議士の寄贈したもの）にある”（坂出前掲書 588 頁）。台湾宏业书局出版了影印版，据此可以了解到初版的一些情况。

影印版无原书封面。康有为的自序之后为总目，分卷目录，第一卷中缝为“志一生理门”，以下各卷类推。第一页下署“南海康有为长素辑”，卷末署“弟子赵秀伟，陈国镛初校，汤辅朝，欧渠甲复校”。有边框，细线格，每页 13 行，每行 30 字。每卷分为若干小类，依次列出：书名、册数、著译者、定价。小类的后边，付有康有为的“提要”。其实，这些文字如后文所述，极少涉及书籍的内容，多是康对该学科发的一些议论。本文姑且将其称为“按语”。

5 《日本书目志》的收录书与按语

《日本书目志》全书 15 卷，共收图书 7725 种，康有为加按语 109 条，具体情况如下：

卷次	分类	图书种数	按语条数	按语字数
第一卷	生理门	366	4	15,00
第二卷	理学门	397	17	3,100
第三卷	宗教门	108	2	510
第四卷	图史门	901	9	2,200
第五卷	政治门	424	14	3,000
第六卷	法律门	450	3	1,000

¹⁴ 《戊戌变法》第四册第 41 页。但，“丁酉印于上海”不确。

	(农工商总序)		1	2,000
第七卷	农业门	404	17	6,000
第八卷	工业门	187	10	3,400
第九卷	商业门	157	7	1,900
第十卷	教育门	740	8	2,800
第十一卷	文学门	903	2	510
第十二卷	文字语言门	860	3	510
第十三卷	美术门	720	7	690
第十四卷	小说门	1,056	1	360
第十五卷	兵书门	52	4	360
	总计	7,725	109	28,340

将图书分门别类的作法中国古已有之，但是康有为的与以前的书目志大为不同。坂出祥伸指出这种分类与传统的图书分类法不符，具有革新性（坂出前揭书 588 页）。又说恐怕是模仿了当时日本的图书分类法，及其分类名称。如后文所述，笔者认为康有为的书目志直接取材于日本书肆的图书目录。虽然未能最后确认康有为使用了何种图书目录，但是，经过翻检当时的图书目录，可以断定在分类排列上，康有为并没有做实质性的改动。如将“家政学”并入“政治门”等不见于日本图书目录的做法也不是康有为根据图书的内容做出的改动，而是康氏想当然的结果。下面，我们先来详细地看一下各卷的收录书和按语的情况。

5-1 第一卷生理门

本卷收录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诊断学、内科学等 22 类，366 种图书，康有为加按语 4 条，约 1,500 字。之所以将生理学放在诸卷之首，康有为解释说：“太平尚仁，刑措不用，含哺歌嬉，极乐长寿，故医学生道，太平之极也。谒千圣之术，止乱安人以卫生而已。（中略）大治在於医，故以冠诸篇焉”（620~621 页）。自序中，康有为也援医学为例，主张治病国必须图新。医学之在康有为是救国之学。这种观点，不禁令我们联想起了早年的鲁迅。在《生理门》的生理学入门书后，康有为加了第一条按语，在按语中，康氏先引《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然后称生理学为“物理学之源，心灵学之本，由此以入于哲学，则四通六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矣”。又说，生理学，“吾《素问》少发其源，泰西近畅其流”，“日本尽译其书，施之学校”（594 页）。但是，通过这些议论我们发现康对生理学、哲学等并无实质性的了解（详下节）¹⁵。

关于解剖学的书，康有为在按语中引据孔子的话证明解剖“于死者无损而生者益”（596 页），并列举了《动物比较解剖图》（四轴、高岭秀夫撰写、六元）、《人体组织揽要》（三册、田口和美编、四元五角）、《须氏组织（新论）》（一册、石川清忠译、一元六角）3 本书名，称这些书为“精作”。

¹⁵ 这一点从康的“若产婆学，尤关生理之本”（620 页）表述中亦可看出。

可以推测, 康有为购得了这些书。

关于卫生学的书籍, 康有为同样在阐发了孔子的观点后说: “日人好洁, 近讲泰西卫生之学甚精, 其饮水通风之法, 防疫看护之方, 亦綦详矣。呜呼! 天子失官, 学在四夷, 此岂非圣人意哉”(600页)。在本卷的末尾, 康有为还总结道: “日本之学, 无不出吾庑下也。其医学亦然”(620页)。这种“西学中源说”式的议论自始至终贯穿康有为的全部按语。

但是, 康在按语中还写道“泰西自康熙时日耳曼人哈芬创人体皆血脉皆血管, (中略) 近显微镜既精, 乃知微丝血管, 又知人与微生物战法”(620页)。由此可知, 他对西医是有一定了解的。同时, 从“血脉、微丝血管、微生物”等术语的使用, 亦可知康有为的医学知识并非来源于日本的医书, 而是傅兰雅的《格致汇编》等书。

本卷收录书籍的书名中有很多日本近代的新词、译词, 这些词后来都为汉语所接受, 例如:

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法医学、神经、动脉、组织、温室、饮料水、百科全书、防疫、药理学、药剂学、临床、便览、分析、病理、霉菌学、绷带、手术学、视力表、精神病学、兽医、狂犬病

同时, 也有一些日语的表达方式最终没能进入汉语, 例如:

局处(解剖学)、看病学、筋肉、虎列刺、独乙、化学的诊法、组织学附、傍训、子育卷

5-2 第二卷理学科

第二卷理学科收录理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矿学、地震学、博物学、生物学、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 19 类¹⁶, 以及哲学、论理学(即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人文科学 4 类的图书共 397 种, 康有为加按语 17 条, 约 3,100 字。为何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图书收入同一卷内? 这种分类是康有为的创意吗? 回答是否定的。这是“理学”一词的意义变化所至。“理学”原指宋代兴起的新儒学, 又称“性理学”。江户后期, 一些兰学家用这个词指称自然科学。明治初期, 西周用“理学”来翻译 philosophy, (如西周的《百学连环》1870~71)。但是, 西周的译名没有为一般所接受, “理学”一词一般指称物理学, 或作为自然科学的总称来使用。

《日本書目志》编纂的 1897 年前后, 尽管作为 philosophy 译词的“理学”已经衰退, 但是在工具书上还保留着上述两种意义。康有为使用的原始材料可能有“理学=哲学”的内容。那么, 康有为对这些学科的理解又怎样呢? 让我们来看看他所加的按语中。

第一条按语加在学校理科教科书(相当于今天的自然常识)之后, 康有为先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发了一通感慨之后, 说: “尝考欧洲所以强者, 为其开智学而穷物理也, 穷物理而知化也”(626页)。但同时又说: “若犹但言军兵炮械而不兴物理之学, 吾岂知所税驾哉”(626页)。可知, 康有为的“物理”乃形而上之学。而对于现代物理学, 康氏引程子说: “能通所以然, 是天下第一等学人”; 对于化学, 康说: “造化、神化、变化、道莫尊於化矣。凡百学皆由化学也; 凡百器用制作之精, 皆由

¹⁶ 化学书中有汉译西书一册, 即嘉约翰的《化学初阶》

化学为之也。化学能析之，能合之，能离之，能乱之，以一物为数物，以数物为一物，错综参合，代化工矣。吾制造局亦译化学书，但不如日本之详”（634页）；对于分析学，康引韩信、朱子的例子后说：“分析是为治之要道哉”；对于天文学，康氏则说欧美日本的历制都“不出孔子的三正”；对于气象学，康认为是春秋以来的知识“日本犹存之”。在按语中，康有为并没有对上述的近代科学书籍做内容上的实质介绍，所发议论也大都不得要领。

坂出祥伸认为康有为通过收集日本书接触了进化论¹⁷。事实如何呢？让我们来看看他在进化论方面的图书8种之后加的按语：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能知天地生物之故，万物生生之原，万物种分类别之故，则天地位，万物育矣。生物之学者，化生之学也，读《万物退化新说》一书，盖技也，而进於道矣。

由这条按语，可以推测康购入了《万物退化新说》，但是并没有读懂。因此，康对进化论是否有所了解还很值得怀疑。

当然不否认对某些学科，康有为是有一定了解的。例如，地质学书的按语中，康言及“积介层、虫层、大草大木层、大鸟大兽层、人层”；矿物学的按语中，提到了“金类、非金类”，并列举了包括“锌、铋、钴、锰、铝、钙”等在内的金属名称。这些都是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提供的知识¹⁸。此外从按语的内容推测，康还读过合信的《全体新论》。

那么，康有为对于收入本卷的哲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的了解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呢？他在哲学类图书后加了如下的按语：

天欤？地欤？神明往欤？不可止沮，造化为庐，哲人同舆，沈精极思，无所不徂，穷人人无。太古之圣，勇智权与，执物徇有，泥迹多粗。中古之圣，畜物而先入居，伦理是图。后圣玄妙，舍实游虚，魂灵如如，其有怀疑，一切扫除，隳人空魔，婆罗辟支，近世物理，冥冥入微，既实又虚，开天天而游其墟。凡圣三统，轮转厥枢，额氏火教，实得理材，孔道阴阳，包尽无余，大地作者，其亦可为心游大观欤！（653页）

从“太古之圣”“中古之圣”等词语判断，康有为似乎把西方的哲学理解成了“贤哲之学”，按语与哲学的学科内容毫无关系。

对西方的心理学也是如此。康先说：“心学固吾孔子旧学哉”，再例举明阳明学的例子，总结说：“泰西析条分理甚秩秩，其微妙玄通，去远内典矣”。从这段按语中也很难看出康有为对心理学有什么实质性的了解。

对伦理学（即逻辑学）康未置一词。但是在伦理学类图书的后面，康有为加了一段按语。他说：中古之圣不谈鬼神怪物而谈人事，“故伦理尤尊”，中国的学问“始于尽伦，而终于尽制”，世界各

¹⁷ 坂出前揭书 596~603页。详见本文 §7。

¹⁸ 地质学类书中有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地学浅释》的日文训点本（乙骨太郎、久保田乙成训点、一册、一元）

国制度大异，君主、民主、一夫数妻、一夫一妻等差异都是不同制度的反映，都是合乎时宜的，是“先圣因时立制，条理灿然，黔首惟有率从而已”（659页）。在这里已经完全是卫道士的面孔了。

本卷的书名中使用的日语词汇如下：

理科、教授法、科学、物理学、进步、理化学、应用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定量分析、定性分析、讲义录、生物学、进化论、退化、人类学、哲学、论理学、归纳法、心理学、伦理学

这些词均为现代汉语所吸收。

5-3 第三卷宗教门

第三卷宗教门收录宗教总记、佛教、佛典、神道、杂教等5类108种图书，按语2条仅510余字。对于日文的宗教方面的图书，康有为评论说：日人所译佛、婆罗门、耶、回之书，及《宗教进化论》《宗教新论》《未来世界论》《天地熔造化育论》，瑰伟连忭而淑婉可观也。日本神学乃儒、佛未东渡之前为东夷旧俗，无足观焉。

本卷的书名中使用的日语词汇有“宗教、神学、演说”等。

5-4 第四卷图史门

图史门即地理、历史学科。本卷收录地理总论、世界地理、各国地理、地文学、日本地图、世界地图、世界史、日本史、传记、年表等25类图书901种，康有为加按语9条，约2,200字。第一条按语附于地理总论，各国地理，小学地理教科书，地文学之后。康有为在按语中说“国朝学者亦喜言地理之学”，“然道路未通，图测未精，但以供考古而已”。康还哀叹包括当道大臣的地理知识极端贫乏，疆土被割，岛屿被占还不知详细。“推原其由，皆学校仅课举业不讲地理之故”。康指出：日人效放西方，小学、中等地理之书皆有。中国也必须改变现状。康有为提到两本书尤其重要，一本是《中等教育如氏地理教科书》（八册，富士谷孝雄讲述，三元三角），另一本是《西伯利地志》（参谋本部编纂二元五角）。由书价可知是两本大部头的书，但很难说是地理学的重要著作，也许康有为恰好买到了这两本书，或者基于当时的形势，特意购买了这两本书。

康有为对世界、各国、日本的地图类二百余种加了第二条按语。康反复强调地图的重要性，无地图，国家就无以为治，“欲士民之智，非令学校课试地理、学童摹图诵题不可得也”。尤其提到了日本的“暗射地图”（即没有写入地名的地图，为小学教学用）。

在世界史类35种图书之后，康有为加了第三条按语。康说过去的史书只记本国而已，“四裔”不过是附庸，而新的史学必言世界。在此康有为披露了他的世界发展史的知识，说：

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例、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凡有三大端焉：一，自倍根创新学而民智大开，易守旧而日新；一，自哥伦布辟新地而地球尽辟，开草昧而文明；一，自巴力门倡民权而君民共治，拨乱世而升平。

据此,康指出,“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以哉”。但是中国“仅有《佐治刍言》一书而已¹⁹。日本所译盖多,而《历史哲学》、《欧罗巴文明史》、《泰西通鉴》及《挈要》、《纲记》诸书备哉灿烂”。指出世界史有他山之石的功效。“历史”一词来自日本,康有为之前不见使用,康在按语部分也没有使用“历史”(时期相同的《时务报》上有是用例)。但是,康有为将近代历史学的概念介绍给了中国。

本卷共收日本史的图书204种,其中包括《大镜》《保元物语》《平家物语》等十几种古典小说。不知是原材料如此,还是康有为另行放入的。在日本史类的图书后,康有为写到:

日本(中略)正史体裁尤未备,本无可采焉。惟自维新以来,大变政俗,以成富强。(中略)日本与吾同在东方,同文,同俗,同政,同教,吾籍日本为经途,为探路,而后安步从之,蚁封九曲,从容驾驶,尽弃阻坂而驱坦途。

从这段按语我们可以看出,康具有向日本学习的明确意识。“酉轩之使亦有求日本之书而谈其政者,然率皆陈其已然之迹,而未考其更变之由”。康有为对此深表不满,指出“今考日本之史,若《日本文明史》、《开化起源史》、《大政三迁史》、《明治历史》、《政史》、《太平记》、《近世史略》、《近世太平记》、《三十年史》,皆变政之迹存焉”。同时说,“吾既别为《日本改制考》以发明其故,而著其近世史之用,以告吾开新之士”。《日本改制考》即《日本变政考》,当时书名还没有最后确定。上列各书应是康有为已经购入的图书,也是《日本变政考》的主要参考书目。

对于传记、年表、记行、名胜、类书等图书,康有为都只付了极短的按语。本卷书名中所见日本新词如下:

暗射图、帝国、案内图、名所绘人、历史哲学、历史读本、发明家、幼稚园、记者、探捡、文库、社会、文艺、

5-5 第五卷政治门

本卷收录国家政治学、政体、行政学、财政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家政学方面的图书17类424种,康有为共加按语14条,约3,000字。“家政学”被收入政治学类,应该是康有为的望文生义,可以推测他并没有见到实物²⁰。

在对政治学书籍所加的按语中,康有为说,“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尝考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经义者也”。接下来,康论证了西方的学校、医院、议院、公园、监狱等制度早见于六经,下结论:“中国所以弱者,皆与经义相反者也”。主张“礼失求野”,说“日本未足以语是。然译泰西之书而能保养其民以自强,其政治亦可借鉴矣”;并再一次提到“吾有日本改制考,庶以为鉴而自正焉”。这种西学中源的主张贯穿《日本书目志》的始终。

在社会学类图书的按语中,康有为写道:

¹⁹ 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译,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85年刊行。原本为*Political Economy*,1852,因此不能算做历史书。

²⁰ 含料理法(即烹饪法)、裁缝书。

大地上，一大会而已。会大群，谓之国；会小群，谓之公司，谓之社会。

康有为把“公司”与“社会”完全等同起来。又说，西方“天文、化、电、光、重、声、汽学，皆有会。制造、农业、商务，女工，皆有会。（中略）日人之骤强也，亦由听民开社会讲求之故”。社会又是社团、学会的等义词。与所列社会学图书的内容完全无涉。可以断言康并没有读这些书。

对于经济学类图书，康有为说“凡六经，皆经济学书也”。这里的“经济”，是中国“经邦济国”的旧义。这一点从同一段按语的“泰西从政者，非从经济学出不得任官，理财富国，尤为经济之要”的表述也可以得到证明。

但是，康有为对统计学、专卖特许（专利）表示了一定的理解。本卷 14 条按语中具体提到了 34 种书名，应是康有为已经购入的图书。其中多次提及《日本政治年鉴》²¹，说：“若夫日本之政治年鉴，于日本变政之故尤详焉。恨吾游日本者未有能留意及此也”，应该是《日本变政考》的参考书，仔细阅读的可能性较大。

本卷书名中所使用的日本新词如下：

社会制、宪法、政体、选举法、立宪、代议、请愿、预算、内阁、政党、裁判、主权、警察、取缔、财政学、会计法、财政学、社会、进化论、社会学、进步、退步、经济学、保险、统计学、特许、意匠、商标、信用组合、殖民论、家政学

5-6 第六卷法律门

本卷收录宪法、法理学、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国际法等 24 类图书 450 种。康有为加按语 3 条约 1,000 字。康有为在本卷末的按语中说：

春秋者，万身之法，万国之法也。尝以泰西公法考之，同者十八九焉。（中略）所谓宪法权力，即春秋所谓名分也，

这种论调与以前各卷的按语并无两样。但是康有为又说，“今吾中国之法，非经义之旧矣”，提出“法至今日，亦不能不变通尽利者也”，“守旧则辱，变法则强”。如实在不愿意主动变法，可以把日本的拿来，为我所用，而且，“力省而功溥，事切而弊少”。指出“其商法、学法、矿法、军法、会社法、银行法、商船法、保险法、皆新法，极详密，吾皆可取尔”。

按语中提到了《国宪泛论》（上中下合本一册，小野梓境二元五角）、《美国宪法史》（岛田乘竹二元三角）、《各国宪法》（一册元老院藏版一元二角）、《万国现行宪法比较》（一册辰巳小二郎四角二分）、《内外臣民公私权考》（一册，井上毅一角六分）等 5 部书。说前 4 种最精美，又说后 1 种“人有自主之权，又有互制之法，泰西之良法哉”。

本卷书名中所见日本词汇如下：

宪法、刑法、帝国、公权、私权、人权、法理学、民法、动产法、相续法、债权、不动产、商法、会社法、手形、手续、宪兵、破产法、组合法、诉讼法、辩护人

²¹ 日本政治年鉴第二回，一册，荒井泰次编辑，一元五角。本书在其它卷亦有提及。

5-7 第七卷农业门

第六卷和第七卷之间，有“农工商总序”一篇，约2,000字。在这篇总序里，康有为主要是针对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中西之间的差距发了一些议论，与所收图书的内容介绍并无直接关系。在这篇总序的末尾，康有为写道：

日本蕞尔岛国，（中略）当咸、同时，频见逼于欧人，国内且乱。地宜国势，比吾近日不如远矣。（中略）今其农工商三业之书，泰西佳书，略以尽译。

康有为又说，“观日本之所以强者，吾中国可以反而求之矣”，反复强调了应该借鉴日本。

第七卷收录农学、农业经济、农政、农业化学、土壤、化肥、农具等19类图书404种，加按语共17条，约6,000字。本卷是康有为发议论最多的一卷。康有为的建议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认识农业的重要性，推广农业保险，改良土壤，用化肥，改良农具，改良品种、多种经营、多种甘蔗、蔬菜、烟草、植树造林、消灭害虫、推广新农业、发展畜牧业、养蚕、种茶、发展渔业。

本卷的按语中，共列举具体书名30种，并说“吾读日本所译土壤篇，何其暗与管子合也”，由此可以推断康有为已经购入部分图书，并阅读了其中的一部分。当时以罗振玉为主，正在组织农学会，康对农业也表示了极大的关心。

本卷书名中所见日本词汇如下：农学、农业、教科书、农场、林业、害虫、水产学。

5-8 第八卷工业门

本卷收录工学、土木学、机械学、电气学、建筑学、测量学等11类图书187种，按语10条约3,400字。康有为在按语中反复强调道路、铁路的重要性，对西方近代工业的历史，如蒸汽机的发明、应用，纺织业的情况做了较详尽地介绍²²。康有为哀叹中国工业的不存在，说：

劝工为九经之一，又为智民富国之本，而吾尚未之知也。（864页）

又说：

日本之於工也，小学校有手工篇以教之，又有讲义录教科使用法解说，以条讲之。小学又有女工篇，以教女子。工务局又有月报，博物馆有制物志料百图，制造所有秘诀簿记教科，（中略）一名一物之制造，皆有专书。（中略）若泰西制造新书，则固已译之矣。（881页）

本卷书名中所见日本词汇如下：工学、土木学、大工、建具、取极、建筑学、共进会、出品、杂志

5-9 第九卷商业门

本卷收录商业、银行、贸易、交通等9类图书157种，按语7条约1,900字。康有为认为中国的败落是由于不重视商业，他在按语中说：知日本所以胜而吾所以败者，即商可见矣。康在按语中阐述了银行的作用，贸易的必要性；同时提到了《商业学校问题答案》《商业读本》《商业指针》《商

²² 蒸汽机的发明家，康称之为“华忒”，这是传教士的译法。由此可知这部分知识来自汉译西书。

业之骨》《商卖秘诀》《商业博物志》《商业产业事迹》《工商技艺看报考》等书名。对《商业学校问题答案》，康有为说“商学之课试，如吾之课举业也”。这些书应该是康已经购入的图书。

本卷书名中所见日本词汇有：商法、经济学、商品学、劝业、应用银行学、手形、国立、为替、取组所、郵便法、相場、簿记学等。

对于“手形”“为替”“相場”等江户时期的商业用语，康有为似乎并不了解其真正的意义。例如对“相場”，康解释说：“欲观国者，宜相国势。欲相货者，宜知物价”。（898页）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5-10 第十卷教育门

本卷收录道德修身学、格言、敕语书、教育学、幼儿教育、教育史等 17 类图书 740 种，按语 8 条约 2,800 字。关于教育，康有为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康指出：“泰西之强，吾中人皆谓其船械之精，军兵之炼也，不知其学校教育之详”；“日人之变法也，先变学校，尽译泰西教育之书，学校之章程”，“观日本小学读本之详，图画之切，其强岂无故哉”。对于日本出版的有关图书，康赞叹道：《教育学》《教育学新论》《原论》《普通学》“备哉灿烂，无微不入”，《学校概论》《日本德国合级小学校》《公私学校比较论》《学校通论》“兼备各国，精微详尽”。（935页）

康有为指出：中国小学无书，“童学十年，而无所知识”。相比之下，日本明治以后大兴教育，“虑中文深奥，杂以伊吕波之片假名，以达其义。不求古雅，但思速下，于是举国皆识字知学”。为此，“建议中国多制小学书，多采俗字以便民”。（961页）康还为设计了十种有浅入深的蒙学书体例。然而主要取材于六经等中国的典籍，并无近代性。

本卷书名中所见日本词汇有：德育、道德学、挂图、演习、教育学、体育学、胎内教育、教授法、教室、教具、幼稚园、特许、发明、明细书、图书馆、教员、士官、幻灯会、俱乐部、物语、等。

5-11 第十一卷文学门

本卷收录文学史、新体诗、和歌、日本戏曲、脚本等 18 类图书 903 种，其中包括小学习字字贴和学习怎样写信的“往来物”。收书的范围大大地溢出了自序中所说的变法自强的目的。本卷康有为只加按语 2 条，仅 510 字。在文学史类的图书后的按语中，康有为说：日本古本无文学，德川之后崇尚孔学，儒家辈出。维新以来，学校遍于全国，无不读书识字者，“观日本之变，可以鉴也。大学纪要，博物馆书目。日本之强，固在文学哉”。康有为在这里似乎把中国传统的“文学”一词的概念与西方近代的文学混同起来了。在日本谣曲（即戏曲）类图书之后，康有为加了另一条按语。康从《诗》说起，然后说“日人自隋唐时来学乐，效吾诗章，其作者雅健有可采者”，但是“终不能抗衡大国。然日人之苦思好学，善师法人之长，故学中，学西，转圆捷疾”。议论愈发不着边际，其后四卷，按语可观者已不多。

5-12 第十二卷文字语言门

本卷收录日本古典文学、中小学作文、应用文、语言学、修辞演说、辞典、速记法等 14 类图书共 860 种，按语 3 条约 510 字。

关于演说，康有为指出：言语是孔子四科之一，备受重视。春秋战国时纵横家活跃，百家争鸣。但是六朝以后“文辞既盛，言语道废”。只有西方“尤尚演说之风”，中国也应该恢复。康有为似乎对演说的形式、功效等多有了解。

康有为在卷末的按语中说，日本僻在荒岛，本无文学也，但是现在各种书籍均有出版，对于启迪民智作用显著。而中国这类书籍皆无，导致“风俗坠坏，人心式微”。

5-13 第十三卷美术门

本卷收录美术、绘画、音乐、戏剧、体操、游戏、插花、茶道、占巫、棋类等 18 类图书 720 种，按语 7 条约 690 字。这里所收录的图书与中国的“变政”并无密切的关系，而康在体育类图书后的按语中说：“泰西男女皆有体操，故能强力任事。日人为体操之教，游戏之事附于舞末，有意哉！”议论已很勉强，而对占卜类的图书，康说：“日本方技学皆吾所传也，无有录存之，以见日俗云尔”。完全是姑妄录之的态度了。

5-14 第十四卷小说门

本卷只收小说 1 类，共 1,056 种，按语 1 条约 360 字。本卷是书目志收书最多的一卷，同时又是按语最短的一卷。所收小说包括日本古典小说、武士小说、近代小说及西方的翻译小说。康有为在惟一的一条按语中说：

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中略）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

利用小说达到启迪民智的作用，可以说与后来的梁启超提倡翻译日本政治小说的着眼点一样（但是康在这里是说用小说讲授六经之义）。但是若真是如此，所开列的小说书目大大地可以删略一下。因为本卷除了明治后的翻译小说、政治小说外，还有大量的江户期的市井小说，如《好色一代男》等混在其中。

5-15 第十五卷兵书门

本卷收录马术、航海、狩猎等 4 类 52 种图书，按语 4 条 360 字。是十五卷中收书最少，按语最短的一卷。真正军事学方面的书籍并未收入。康有为指出：“此兵书盖寡，盖日人之骤强，在变旧俗，开新学”。但是，这种把现代军事科学与其它学科对立起来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6 关于《日本书目志》的素材

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是根据什么材料编纂的呢？他利用了日本出版社、书肆的数种图书目录，对此似不应有疑问。问题是康有为在利用日本的原始材料时是否做过某些改动，或者说进行了

书店的图书分类还没有统一。从当时的图书目录来看，一般是分成汉、和、译三大类²³，“汉”即是中国的典籍（汉籍），这是当时日本知识阶层的基本书籍；“和”是传统的日本书籍，包括日本的古典诗歌、文学作品；“译”即外文书的日译本，但在当时除了翻译书外，讲授西方近代知识的新书、教科书等也放入译书一类。中国的典籍按传统的经史子集排列，而和书的分类常常因出版社而异。书肆的图书目录较常见的是以某某门进行分类，排列方式一般是竖排，依次为书名、册数、著译者、定价。例如，以法律书为主的博闻社明治 24 年（1891）的书目抄录的分类和版面如图 1 所示。可以说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与日本图书目录的版面形式完全相同。图 2，图 3 分别是《须原屋发兑图书总目录》（明治 38 年 1905）、《金港堂图书目录》（大正 3 年 1913）的目次。从事图书租赁业务的共益贷本社的目录《共益贷本社书籍和汉书分类目录》（明治 20 年 1887）则设“和文书门、汉文书门、译书门、英书”四类，而包括小说在内的所有新学书都放在“译书门”里。5-5 节中我们曾提及，家政类图书在《日本书目志》中被置于“政治门”卷下。日本各类图书目录不见这样的例子，应该是康有为想当然的结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下结论：康有为并没有有意识地去改变所收图书的分类。

總目錄索引

○漢文學之部	一
○詩文集詁附詩作之部	一六
○和文和歌之部	一八
○俳書俳諧集之部	一五
○插花及茶の湯之部	一七
○園林之部	一九
○音樂之部	二一
○論曲之部	二二
○繪物、骨董、書畫、刀劍	二二
○經史及傳記之部	二五
○地理并に地圖之部	二八
○經濟學法律學之部	三一
○算術之部	三四
○物理化學之部	三六
○礦物學植物學及動物學之部	三七
○哲學論理學倫理學之部	三九
○農學蠶業水產山林學之部	四〇
○家政及料理、裁縫書之部	四四
○占考之部	四四
○鍼灸及漢藥書之部	五一
○修身書之部	五一
○記事論說作文書之部	五四
○字典之部	五四
○神道書之部	五八
○雜書之部	六〇
○雜形之部	六〇
○佛書經文部	六五

图 2

金港堂發行
圖書目錄

倫理及修養書類	六五
教育書類	六七
哲學及宗教	七〇
社會學心理學及論理學	七三
法術經濟	七四
國文習字及圖畫	七五
漢書類	七八
外國語	八一
辭書類	八三
地理及紀行	八四
歷史及傳記	八五
博物理化及數學	八八
實業書類	九〇
文藝及小說	九一
音樂及體操	九四
軍事書類	九五
婦人及家庭書類	九六
少年少女書類	九八
雜書類	一〇四
日記類	一〇五

图 3

²³ 少数书店还有洋书，即外文书一类。另，承蒙神户松荫女子学院大学青木稔弥先生惠借明治末、大正、昭和初（1890-1930）书店图书目录数种，在此谨致衷心感谢。

7 甲午以后的日本书及康有为的容受能力

编纂《日本书目志》的过程中，康有为实际购入了多少日本书？康有为大量接触日本书当在甲午之后，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序中说：“乙未和议成，大搜日本群书”，又在自编年谱光绪 22 年（1896）项下记：“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但从按语中提到的书名判断，总数不会超过数百册。当时的中国，日本书的流通渠道、销售机关均未建立，图书的购入主要依靠往来的人员。时务报、农学社曾委托担当日文翻译的古城贞吉从日本采购大量的图书即是一例²⁴。

那么，从已经购入的日本书里康有为得到了哪些新知识呢？康有为本人不懂日语²⁵，主要依靠其女康同薇的帮助。《日本变政考》序中“臣女同薇，粗通东文”的表述，卷首又注“原本所译日文太奥，顷加润色，令文从字顺”。可见康同薇的日语能力亦非完全无问题。即使日语能力全无问题，康同薇也不可能把所收集到的日本书逐一翻译或口述给康有为。通过对康本人所加的按语的分析，可以推断：至少在 1897 年 5 月《日本书目志》完成前后，康有为从日本书得到的新知识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人文领域。不能因为书目志上列有书名就断定康有为阅读了这些书，并受到了影响。例如，马洪林认为：康有为接受进化论，“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重要途径是通过日本学人的著作”²⁶，并“对这些书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和看法”²⁷。对此，汤志均提出了尖锐的质疑²⁸。

在上面的章节中，我们列出了各卷所收图书的书名中的新词汇。这些词汇还不见于当时中国的出版物。然而，是不是可以象有些论文那样，认为康有为使用了这些新词，并把这些词导入了汉语呢？例如，吴国盛写道：“当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 science。起初一直译为“格致”，后来受日本影响译为“科学”。1897 年，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中引进了这个词”²⁹。章启群说：“1897 年，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便使用了“美学”一词”³⁰。但是，笔者对这样的观点持否定的态度。因为，这里的“科学、美学”只不过是作为书名的一部分加以引用而已。康有为在按语中既没有使用“科学”，也没有使用“美学”。书名里的“科学、美学”对康有为来说充其量只是一种符号，而不是“词”，康有为并不理解这些新词的意义。即使那些在按语中使用的新词，康有为也不一定准确把握了词的意义，大多数场合不过望文生义，聊加引申罢了。例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社会”等就是如此。关于“科学”一词，陶世龙指出：

维新运动的发动者康有为，首先在中国使用了“科学”一词。1897 年，康有为撰成《日本书目志》，在卷二理学门中列有普及社译的《科学入门》、木村骏吉著《科学之原理》；次年

²⁴ 参见沈国威等“欧化国家を目指せ：情報発信基地としての 19 世紀日本——日本新聞の中国語訳を通してみる近代日中語彙交流”（松下国际财团研究助成研究成果报告书 1998）

²⁵ 康有为认为日语数月可通，梁启超亦有过类似的说法，是否受到了康的影响不得而知。当然这只是康的错觉。即使明治期的用“汉文调”写的文章，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准确无误地读懂。

²⁶ 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55 页

²⁷ 马洪林前引书 155 页

²⁸ 汤志均“再论康有为与今文经学”《历史研究》2000 年第 6 期 72~79 页

²⁹ 吴国盛“科学与人文”（北大科技哲学 <http://www.phil.pku.edu.cn/post/>）

³⁰ 章启群“中国美术研究的学术性问题”（北大哲学论坛 <http://www.phil.pku.edu.cn/forum/>）

即戊戌变法之年，康有为在夏历四月上清帝的“请废八股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痛斥用八股文取士使当时的知识分子“不知不识，无才无用，盲聋老死”，犹如被活埋。建议应让这些知识分子“从事科学，讲求政艺”，此处的“科学”与“政艺”相对排比；还有讲科学的书被归入理学门，都说明康有为首次在中国使用的科学一词系指自然科学。在此以前，惯用的译名是“格致”³¹。

就是说康有为有意识地使用“科学”是在1898年以后。这里的“科学”是否真正等于 science 尚需讨论，但这种综合考虑语境（即上下文）的方法是应该提倡的。

8 结语

在《日本书目志》刊行之前，康有为已完成了《日本变政考》的初稿。如上所述，在呈给光绪帝的版本卷首，有“原本所译日文太奥，顷加润色，令文从字顺”等句。但是这些错误并没有完全改正过来。台湾版的《日本变政考》中，出版校订者做了订正。有一些是笔误，另有一些则是对日语的错误理解³²。《日本变政考》上呈之后深藏宫内，《日本书目志》所产生的影响亦不能做过高的估计。这本书与其说在介绍日本书、导入日语语词方面发挥了作用，毋宁说书中的按语突出反映了康有为援用今文经学倡言变法的思想。

但是，最早提出利用日本书导入西学的正是康有为，此功不可没。而他的主张最终由留日学生具体地付诸实践了。对于这位开拓者是怎样利用日本书的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日本变政考》是一个值得从翻译学角度详加探讨的文献。

附记：2002年夏，有幸作为访问学者（关西大学与北京大学的交流项目）在北京大学勺园盘桓近两月，本文即在北京期间收集材料，完成初稿的。衷心感谢两大学为我提供的宝贵机会。同时，在京期间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王扬宗研究员的多方帮助，谨致谢忱。另，本文为关西大学2001年度学部共同研究“間言語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と文化の關係体系”的一部分。

³¹ 陶世龙“科学：精神的武装——对科普创作的再认识”（科普创作1991年第1期 <http://sltiao.home.sohu.com/slkj005.htm>）

³² 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十》宏业书局